

冲突与整合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社会学阐释

林 红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济南 250100)

[摘要]文化社会学认为文化冲突是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文化整合是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生的文化场域来看,由时代性与民族性所造成的文化冲突是两个最主要的方面。基于时代性的文化冲突引发了高势位文化向低势位文化的传播,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必然性;基于民族性的文化冲突则决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以马克思主义为主位文化,对传统文化进行选择与建构,实现文化整合。

[关键词]时代性;民族性;文化冲突;文化整合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234(2014)09—0008—0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在近百年中西文化大碰撞和大融合的背景下产生的。文化社会学认为文化冲突是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文化整合是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从文化社会学的视角阐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冲突的性质及过程,对于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生、发展及变化的规律有着重要的意义。

文化冲突是指“不同性质的文化之间的矛盾性的表现”^{[1](P295)},导致文化冲突的原因多种多样,诸如区域、时代、民族以至阶级、集团等。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生的文化场域来看,时代性与民族性差异是导致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冲突的两个主要方面。

一、时代性冲突与文化传播的必然性

从文化的存在状态来看,任何一种文化都可以被纳入一定的时空框架并加以定位,因此往往具有时代性和民族性的特征。从文化的发展变化来看,一切文化又总是在特定的时空坐标中确定自身并实现演化,因而必然体现着时代性和民族性的统一。但由于不同的文化在各自演化过程中存在着非同步性,因而造成其在发展层次和态势上存在着时间落差,此即文化的时代性差异。这种差异往往表现为文化发展水平的差异,与文化的民族风格和先进性无关,它是由不同社会阶段之间的差距所决定的,正如恩格斯所言,

“任何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2](P436)}在同一个历史发展阶段上,不同国家的文化和文明发展程度是有强弱之别的,这种文化势位的落差往往决定了文化传播的方向。一般而言,文化和文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往往呈现出蓬勃向上的态势,会不断向外扩张和辐射;而在文化和文明相对落后的国家和地区,一方面会因自身文化的凋蔽难以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形成文化引进的强烈愿望;另一方面,对发达地区文化的崇拜心理,也会对外来文化的引进和接收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就文化传播的方向而言,一般总是由文化发达的高处流向文化不发达的低处。如中国历史上汉民族形成的发达的农业文化对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的传播和影响,西方历史上罗马文化对日耳曼民族文化的征服等。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资产阶级“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3](P36)}

自14世纪以来,欧洲经历了诸如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等一系列文化变革后,在政治上,资产阶级逐渐取代封建贵族掌握了统治地位;在经济上,工业革命的变革高潮使资本主义经济空前发展,世界市场逐步形成。在完成了

[收稿日期]2014—08—23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研究”(11JJDZ003)、“2013年山东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计划(思想政治教育专题研究)项目(J13SW51)”。

[作者简介]林红(1972—),女,山东日照人。博士,副教授,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士后,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

文化、政治和产业这三场变革之后,至18世纪下半叶,一个崭新的西方工业文明崛起于欧洲西北部。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的经济和政治的反映,这种融合了基督教文化、理性主义文化和科学主义文化的近代资本主义文化也逐渐崛起为一种高势位的文化,这种文化对经济和政治的反作用则使欧洲逐渐摆脱了中世纪的阴霾走向现代化。

与此同时,地处欧亚大陆东部的中国,自明朝中叶以来却一直陶醉在“天朝大国”的美梦中,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封建主义文化早已呈衰败之势。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中国国门洞开,“进行国际贸易和战争和西方”向“坚持农业和官僚政治的中国”发起了涉及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全方位的挑战,但早已日渐式微的中国传统文化却无力应对。中国传统文化所遭遇的挑战,实质上就是文化时代性的挑战。历史学家翦伯赞曾以中日甲午战争为例说明近代中国和日本的较量,不仅是两个国家的较量,更是两种文化的较量。他指出,“甲午之战从表面上看,是中日战争;但从本质上看,则是日本资本主义对中国残余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清算,而这也就是中国失败的最主要原因。”^{[4](P338)}五四时期,两种文化在时代性上的冲突曾激发起不少仁人志士用古代中国的国民性格去对比近代西方国家的国民性格,用旧时代的盲从态度去对比新时代的科学态度,用陈旧的专制习惯去对比新兴的民主习惯等等,并得出了告别过去,再造青春中华的结论。1923年,瞿秋白在《新青年》上撰文称,“东西文化的差异,其实不过是时间上的……是时间上的迟速,而非性质上的差别。”^{[5](P9)}可见,中国传统文化在时间上的滞后性,造成了西学东渐的必然发生,其实质就是高势位文化向低势位文化的传播,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文化的时代性冲突决定了近代资本主义文化向中国传播的必然性。正如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近代中国由于封建主义文化自身的落后,民族危机的加重,引进资本主义文化的狂飙便不可避免。诚如毛泽东所言,自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先进的中国人历经千辛万苦向西方寻找真理,“被迫从帝国主义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6](P1403)}近代中国对西方文化的选择从器物、制度到精神逐步深化的脉络,充分地表达了力求用资本主义文化取代封建主义文化的诉求。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空前劫难却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西方工业文明产生了危机感。梁启超在其《欧游心影录》中曾说:“大凡一个人,若使有个安心立命的所在,虽然外界种种困苦,也容易抵抗过去,近来欧洲人,却把这件没有了。”^{[7](P10)}不难看出,梁启超已然认识到近代资本主义文化虽然发达,但缺少个“安心立命的所在”。对近代资本主义文化的失望,使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出现了两种新的探求:一是回归传统;二是引入人类发展最前沿的文化,以实现对封建主义文化和资本主义文化的双重超越。

何谓人类发展最前沿的文化?文化社会学认为文化的时代性与先进性并不等同,时代性更多的表明此种文化产生的必然性,而先进性则表明的是此种文化所代表的是社

会进步的潮流,体现历史发展的规律。此时站在人类文化最前沿的当属马克思主义。李大钊在《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中指出,“由今言之东洋文明既衰颓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下,为救世界之危机,非有第三新文明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俄罗斯之文明诚足以当媒介东西之任,而东西文明真正之调和则终非二种文明本身之觉醒万不为功”^{[8](P214)}。陈独秀也指出:“近世文明之发生也……政治之不平等,一变而为社会之不平等;君主贵族之压制,一变而为资本家之压制,此近世文明之缺点,无容讳言者也。欲去此不平等与压制,继政治革命而谋社会革命者,社会主义是也。”^{[9](P138)}可见,能够实现封建主义文化和近代资本主义文化双重超越的就是马克思主义,正如瞿秋白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将开全人类文化的新道路,亦即此足以光复四千年文物灿烂的中国文化”^{[10](P213)}。

可见,正是文化的时代性冲突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的必然性,也是由高势位文化向低势位文化传播规律所决定的;文化的时代性与先进性的冲突则决定了历史主体的文化选择,选择马克思主义以实现封建主义文化和近代资本主义文化的双重超越。

二、民族性冲突与文化整合的必然性

文化的民族性是指一个民族所创造和享用的文化具有和其他民族相区别的特色和个性,它体现在一个民族文化的多个层面,既有物质文化层面,也有行为文化和精神文化层面。由于不同民族在地理环境、生产方式和社会条件等方面存在着差异,因此文化的民族性冲突不可避免。这种冲突往往要求外来文化在传播过程中要结合本土文化,进行文化整合。

文化整合是指在异质文化相互接触过程中,“一个文化系统作为主位文化,以其文化价值为核心,以自身内在结构为参照而对其它客位文化的文化特质的选择和建构”^{[11](P37)}。简言之,文化整合是指不同文化相互吸收、融合趋于一体化的过程。文化整合使原来渊源不同、性质不同、价值取向不同的文化,在内容与形式、性质与功能等方面不断发生变化,特别是为共同适应社会的需要,逐渐融合,最终形成新的文化体系。但是文化整合并不是不同文化的机械组合,而是不同文化相互吸收、融合产生一种新的文化。如中国化佛教的代表禅宗,它既包含了印度佛教的内容,又融合了中国儒家哲学和黄老哲学的精髓,是在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一种新的文化体系。一般来说,一种文化体系,愈是重构了不同的文化特质,往往就愈丰富、愈有生命力;同样,一种文化体系愈丰富、愈有生命力,它的重构能力往往就越强。

作为一种文化体系,马克思主义是19世纪资本主义社会深刻矛盾的反映,其文化形态、思维特点都具有欧洲传统文化的浓厚色彩。因此,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面临着与原来截然不同的文化境遇,这种文化境遇的转变,就要求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以中国的实际为出发点,“使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变为中国形式”^{[12](P335)},这个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整合的过程。就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而言,在文化整合中具体表现为主位

文化对客位文化的文化特质的选择和建构关系,即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以马克思主义这一代表先进社会形态的思想文化为核心和参照系,采取不同的方式,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改造,使马克思主义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内容上都具有中国的民族特点,成为中国人民特有的理论。

第一,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独具特色的范畴改造成符合时代主题需要的新范畴。

“实事求是”是中国儒家实用理性思维方式的经典表述,它源于《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其中有“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一语。唐代史家颜师古训其“为务得事实,每求真”意即务必求得事实根据,探求真实的结论。清初学者顾炎武曾以经世致用之“实学”,反对宋明理学言心言性之“空谈”。后来乾嘉汉学训释经义,更加强调“实事求是,不主一家”。可见,“实事求是”原本是一种汉学考据学的学风和方法。1941年,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对“实事求是”做了全新的解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13](P801)}毛泽东根据时代主题的转换,赋予了“实事求是”以新的时代内涵,并使其成为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和党的思想路线的精确概括,“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14](P278)}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和“灵魂”,“实事求是”不仅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弘扬和发展。

第二,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与马克思主义精神内涵相契合的概念范畴,努力克服其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使其科学化。

中国传统哲学有着悠久的辩证法传统,这为中国人接受和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矛盾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因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中国传统的辩证法又带有一定的循环论和均衡论的色彩。为此,毛泽东对其进行了根本的改造和科学的总结,他深刻地阐述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矛盾的斗争性和同一性及其相互关系,并从“矛盾的普遍性即寓于特殊性之中”的原理引申出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实践结论,表现出了鲜明的中国特色。另外,知行问题也是中国哲学史上一个聚讼不已的论题,先哲们对心物、知行之辩,对知依赖于行,主观必须符合客观有着朴素而直观的认识。但是他们往往把“行”理解个人的道德践履,没有看到人的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才是联结主观和客观的真正桥梁。1950年,毛泽东在发表《实践论》时,加了一个副标题“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他立足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理论立场,以科学的实践概念为基础考察知行问题,特别强调“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15](P282)}。他提出的关于“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等观点,推动了中国几千年来知行学说的发展,并使其达到一个新高度。另外,毛泽东还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同

群众观点结合起来,将其具体化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的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创造性贡献。

第三,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价值理念进行整合阐发。

作为中华民族的处世准则和价值目标,“和而不同”源于《国语·郑语》。“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生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意即只有不同的事物和谐相处,才能产生新的事物,才能发展壮大。如果只有一种声音、一种颜色、一种味道,则无法做出评价,也不能成为美的音乐、美的文彩和美的味道。“和而不同”在肯定事物多样性的前提下,主张以宽广的胸襟包容不同的见解。这种承认差异,不断交流,互相补充的价值取向,成为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源泉和动力。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针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创造性地阐发了“和而不同”的价值理念,提出了诸如“统一战线”、“和平共处”、“一国两制”、“世界文明多样性”、“和谐社会”等一系列新理论、新原则和新构想。

综上所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文化现象中,两种文化在时代性上的冲突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的必然性,在民族性上的冲突决定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形成的必然性。

〔参 考 文 献〕

- [1] 司马云杰.文化社会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4] 翦伯赞史学论文选集(第1辑)[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 [5] 瞿秋白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 [6] 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7]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23)[M].北京:中华书局,1989.
- [8] 李大钊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 [9] 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 [10] 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 [11] 胡启勇.文化整合论[J].贵州民族学院学报 2002, (01).
- [12] 刘少奇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 [13] 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14] 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15] 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责任编辑:谭文富]